

## 書 評

吳翎君\*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

Jeff Kyong-McClain and Joseph Tse-hei Lee (eds.)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Sino-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258 pages

ISBN 978-103-249-786-0

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美中關係變得日益重要和複雜。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政治、教育文化的互動都在增長，但最引人注目的教育交流項目可能是「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簡稱 CI）的設置和爭議。如同我們所知，目前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對中美知識文化交流可能帶來的意識形態逆滲透以及可能被竊取的高科技戒慎恐懼，中美教育文化的交流正走向歷史的谷底。2024 年出版的論著《從傳教士教育到孔子學院：中美文化交流的歷史反思》（*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Sino-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係 2021 年於 Idaho Asia Institute at Idaho University 召開的一場同名研討會，會後經修改出版的學術論文集。論文集的導言一開始就引述 2019 年 5 月耶魯大學校長 Peter Salovey 的公開信 “To Yale Community”，表示耶魯大學將確保國際學生和學者對營造大學社區的重要性，由於中美關係緊張所帶來的不安以及學術交流審查的加劇，耶魯大學有必要做此聲明。然而，不到一年，美國教育部就宣佈對耶魯大學和哈佛大學未公開的外國資金（其中不乏來自中國的資金）進行調查，這進一步表明了中美教育交流在民族主義日益盛行的極端時代所處的不穩定地位。

這本帶有現實關懷的會議論文集，由兩位歷史學者 Jeff Kyong-McClain 和李

---

\* 作者電子郵件信箱：wulinchun@ntnu.edu.tw

榭熙 (Joseph Tse-hei Lee) 所編撰，結合十二位來自不同人文與社會科學背景的學者，梳理晚清以來美國傳教士在華教育的傳播，歷經不同階段中美教育文化交流的演變，以至於二十世紀末成立孔子學院之爭議。學術論文集的意義在於可以用最短時間，以眾人之力，帶來最新的研究成果，特別是有時效意義的主題。這本論文集不僅已不再重彈四、五十年前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1907-1991) 等前輩學者立基於西方中心觀點所形成的「西力衝擊／中國回應」論述，更希望從中美兩國之間的雙向互動，而非單一方向的主動者或被動者的角色，來探討中美教育文化的交流。<sup>1</sup> 在當前中美關係低落之際，編者意圖從百餘年中美文化交流的衝突和包容，反思近二十餘年來以孔子學院為旗幟的中美文化交流由興而衰，乃至目前的倒退困局；本書以清末民初、南京十年、冷戰時代和孔子學院成立後等四個延續的歷史時段個案為例，分析近代以來中美交流所遭遇的各種問題及其原因，並期待藉由歷史的回溯，獲得未來相互諒解的可能性。

書名《從傳教士教育到孔子學院》，顧名思義係以二個主題串起中美近代教育文化交流：一、美國傳教士在華的教育活動，二、孔子學院。這二大議題過去的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從十九世紀末到 1949 年 10 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前，可說是由美國基督教會及美國人所主導的交流活動，歷經冷戰時期意識形態的對立和文化交流的停滯閉鎖，到近二十年來中國國務院成立「國家漢語國際推廣領導小組」（簡稱：漢辦）主導孔子學院政策，大舉進駐美國高等教育和中小學孔子課堂。爾後，孔子學院的運作方式引起美國全國學者協會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 等機構的嚴厲批評，芝加哥大學於 2014 年正式關閉孔子學院，之後其他學校也紛紛仿效。就百餘年中美教育交流而言，編者收納這兩大主題，顯然帶有一種文化風向的逆轉或對比之意味，從 1949 年以前中美文化的雙向開放交流，對照今日美國人憂懼孔子學院的文化滲透和中國特色的意識形態傳播，本書將這二大題旨融於一書，直接挑明了它的現實意義。本書首要特色為來自不同學科、有理論依據和實證調查的開展，如編者所言：「希望這些研究能夠在有關中美教育文化如何相遇的公開辯論中，超越以中國為中心和以歐洲為中心的偏見。」（頁 3）全書共分為四大部分，每部分三篇論文，為方便評介這十二篇論文，本文將各篇作者和標題置於註腳。

<sup>1</sup> 關於英文學界對中美關係史研究趨勢的演變，可參考：吳翎君，〈從徐國琦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談美國學界對中美關係史研究的新取徑〉，《臺大歷史學報》，55（臺北：2015），頁 219-249；吳翎君，〈英文學界關於「跨國史」研究新趨勢與跨國企業研究〉，《新史學》，28.3（臺北：2017），頁 207-240。

第一部分，清末民初的師生交流 (Student-Faculty Exchanges in Late Qing-Early Republic Era)，著重這一時期的中美文化交流面向。第一篇論文探討日俄戰爭後的 1905 年，一群知識青年和教育家在上海成立寰球中國學生會 (The World's Chinese Student)，這一組織的發起人為復旦大學校長李登輝 (1873-1947)。過去的研究較多著重留美學生的海外活動，而對中國本土這一組織改革動向的關注較少。作者闡釋這一群體組織頗有以美國為師的想法，他們希望透過與美國的友好關係來協助中國的進步，支持清廷的改革。與此同時他們有意抵制對日本改革經驗的仿效，留日學生在這一組織中的地位不高。<sup>2</sup> 第二篇論文探討著名經濟學家馬寅初 (1882-1982) 早期在美國的學習經驗和知識思想，馬寅初受到耶魯計量經濟學專家費雪 (Irving Fisher, 1867-1947) 和哥倫比亞大學公共財政學教授塞利格曼 (Edwin Seligman, 1861-1939) 的影響，這兩位經濟學大師的職業生涯輾轉於學術界、政府和公共評論之間，為中國新一代公共知識分子提供了榜樣。這段在美國早期的求學經歷，影響馬寅初在 1930 年代以後成為一名敢言的公共知識分子，馬寅初在 1940 年代和蔣介石對計劃經濟的想法就有很多衝突。不過，作者進一步分析 1910-1920 年間的馬寅初，正因為受到美國求學經歷和進步時代精神的影響，他當時的立場要溫和許多——認為中國不需要激進革命；相反地，中國需要一個健全的稅收、財政和法律體系來鼓勵財富的積累，最終將財富轉化為公共福利。<sup>3</sup> 第三篇論文，探討一名學者兼傳教士 Gregory Dexter Walcott (1869-1959) 在 1917-1918 年間於清華大學擔任客座教授的跨國經驗，他將哲學、社會學和心理學等西方現代學科引入中國。此人的教學啟發了許多清華學生，這些學生後來在美國接受培訓成為中國學術界和高等教育界的領袖。1950 年代，Walcott 還在長島大學庇護了他的兩名前清華學生。此章觸及過去較少被注意到的二十世紀初中美學者在跨國教育網絡所建立的新社會關係，例如 Walcott 之所以能到清華大學客座係由他在哥大的校友顧維鈞 (1888-1985) 居中牽線 (頁 48)。<sup>4</sup>

第二部分，南京十年的課程發展與校園體驗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sup>2</sup> Daniel Barish, "The World's Chinese Students' Journal and American-Influenced Education Reforms on the Eve of Revolution in China, 1905-1911," in Jeff Kyong-McClain and Joseph Tse-hei Lee (eds.),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Historical Reflections on Sino-American Cultural Exchang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24), pp. 11-30.

<sup>3</sup> Austin Dean, "The Emerging Chinese Public Intellectual: Ma Yinchu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7-1914," in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pp. 31-44.

<sup>4</sup> Chen Huaiyu, "Sailing to China: The Transnational Experience of Gregory Dexter Walcott at Tsinghua," in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pp. 45-60.

Campus Experience in the Nanjing Decade)。第一篇探討燕京大學教育家吳雷川(1870-1944)對儒家思想終極關懷——「成人」(being human)、「成仁」之德性和獻身教會大學的奮鬥。吳雷川是進士出身，皈依基督教，在教育權復辟運動中被任命為中國的一所美國基督教學院——燕京大學的副校長，後來又被任命為名義上的校長。然而，吳雷川對燕京大學的管理幾乎沒有任何權力，因為真正的大權掌握在燕京大學的創校校長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 1876-1962)手中。吳氏曾起草一份中文版的燕大憲章(The Chinese Constitution of Yenching)，但不被重視。心灰意冷的吳雷川在擔任四年校長後辭職，投身於撰寫有關基督教和中國文化的書籍；呼籲要建立一個具有中國文化特色的基督教會，必須有「本色化」的思維。該文認為吳雷川與司徒雷登之間並不一定是個人衝突，而是一種不可避免的文化衝突，具體表現在他們各自對在中國建立一所高等教育機構的看法上。<sup>5</sup> 第二篇論文探討了 1930-1940 年間，在中國鄉村推廣家政教育和中美家政學家(home economists)的夥伴關係，介紹了三位畢業於中國金陵女子學院並隨後在美國獲得農村發展專業高級學位的女性經歷。通過對報告、學術著作和信件（其中許多來自金陵女子學院院長吳貽芳(1893-1985)）的分析，我們看到了二十世紀 30-40 年代解決農村問題中性別的因素和演變性質。此文描述了馬德音(1905-?)、李美筠(1901-2000)和吳璿儀(吳璇儀, 1911-1981)如何通過教育選擇和其他經歷來塑造自己的職業身分，例如參加美國南部由推廣專家組織的農村計劃考察。延伸到日後的發展而言，這些跨太平洋的互動象徵著冷戰初期有關全球現代化、農村發展和人道主義努力中婦女角色的更廣泛國際對話。<sup>6</sup> 第三篇論文探討，從 1908 年開始，弟兄會(Church of the Brethren)從美國向中國山西派遣了第一批傳教士。除了傳福音，弟兄會還強調教育的重要性，到了 1920 年代，他們在山西省各地建立了學校，而這一時期是中美教育交流的鼎盛時期。因此，當 1925 年中國反帝運動興起，中國學生開始指責他們是西方帝國主義並要求改變學校教育時，弟兄會的傳教士們大吃一驚。作為回應，傳教士開始根據中國公眾的要求，向教育部登記，並著手「本色化」學校的課程和結構。1930 年代弟兄會在華擴張教育的宏偉計劃開始減弱，並在 1937 年的日本

<sup>5</sup> Chu Sin-jan, "Being Human: Yenching Educator Wu Leichuan and a Struggling China," in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pp. 61-81.

<sup>6</sup> Helen Schneider, "Trans-Pacific Development Agents: Chinese Female Students and American Rural Extension Education in the Republican Period," in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pp. 82-100.

侵華戰爭中徹底夭折。<sup>7</sup>

第三部分，冷戰／毛澤東時代的動員學生 (Co-opting Students in the Cold War/Maoist Era)。第一篇論文，探討 1949 年後國共政權轉移的情勢下，中國留美學生日益凸顯的戰略價值，紐約華美協進社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26 年成立) 在中美文化交流上的承續與轉折角色。在孟治 (Meng Zhi, 1900-1990) 的領導下，華美協進社扮演留美學生在美國必須完成學業並安排他們在美國定居的主要倡議者，但卻往往被人遺忘。該文梳理了孟治獻身服務留美學生的信念和經驗，也反映了華美協進社的贊助人——堅定的反共者亨利·盧斯 (Henry Luce, 1898-1967) 在冷戰緊張局勢加劇的情況下對持續推動和共產中國的教育交流之態度。作者認為冷戰時期的緊張局勢中斷了旨在支持非中國籍學生進一步學習中國文化的「中國政府獎學金」。該獎學金由華美協進社管理，本可以增加中美教育交流的雙向流動，最後在冷戰時期走向封閉。<sup>8</sup> 第二篇論文，討論 1949 年初中國共產黨取得全國勝利前夕，中共就試圖在校園內鉗制美國的影響力。到 1950 年冬，隨著朝鮮戰爭如火如荼地展開，中共大幅加強了反美宣傳，以實現區分盟友和敵人的重要目標。中共領導人期望學生和教師絕對忠誠，並試圖招募他們充實龐大的宣傳隊伍，將宣傳活動深入並擴展到其他社會階層。該文認為師生們被動員的情境相當複雜，有一些人儘管反對美國政府在臺灣和朝鮮半島的行動，但沒有明確譴責美國，尤其是不得不默認美國人在科技方面的傲人成就；另一些人則對美國龐大先進的原子彈武器感到恐懼；也有一些學生活動分子興奮地支持抗美援朝戰爭。該文的貢獻在於指出 1949-1950 年中共動員校園反美政治活動所面臨的侷限和多元面向。<sup>9</sup> 第三篇論文，探討香港銀行家和教育家林子豐 (1892-1971) 如何調動美國教會資源，在 1950 年代中期推動香港浸會書院的成立和運作。戰後初期，香港政府給予高等教育的資源嚴重不足，無法滿足日益增長的需求，許多家境貧寒的本地青少年不得不放棄上大學的夢想。美國浸信會不僅提供資金支持學院的校園建設，補貼學院的早期運營，還派遣不同學術領域的專家傳教士擔任學院的講師。林子豐和美國

<sup>7</sup> Jeff Bach and David Kenley, "Educational Crisis in Shanxi: An Analysis of Brethren Mission Schools in Republican China," in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pp. 101-116.

<sup>8</sup> Zheng Yanqiu, "The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nstituency and the Student Turn in Sino-American Relations in the Mid-Twentieth Century," in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pp. 119-135.

<sup>9</sup> Ma Zhao, "Preaching Anti-Americanism on Campus: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Propaganda State in Revolutionary China," in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pp. 136-152.

基督教資源的合作，幫助香港浸會書院度過了成立後最初二十年的艱難時期。這一高等教育項目也標誌著冷戰初期東西方基督徒跨國合作的重要時刻。<sup>10</sup>

第四部分，孔子學院在美國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第一篇論文以美國的六所孔子學院為對象，研究考察了這些孔子學院的漢語課程和外聯項目，並分析它們如何促進中國文化軟實力的提升。此研究結合了對中共漢辦的官網報導、宣傳機構出版物和學術文獻的嚴格審查，以及對這些項目參與者的訪談。研究結果表明，這些中美交流項目於塑造中國在美國的軟實力形象方面並不十分有效。儘管負責中美交流學院的師生積極回饋，但美國人普遍對這些交流項目及其機構的使命知之甚少，美國民間機構也越來越懷疑中國建立孔子學院的意圖。<sup>11</sup> 第二篇論文探討 2004 年第一所孔子學院在美國校園成立以來，美國的孔子學院引起了公眾的廣泛關注。作者認為孔子學院為 K-12 (幼稚園到高中) 和中學以後的教育機構提供了學習普通話的師資，但反對者則表示懷疑和批評，其中一些批評非常嚴厲，以至於嚴重影響了跨文化機構在美國的運作。此章試圖討論跨文化交流協議、跨文化交流機構的運作、跨文化交流協議的重新談判以及跨文化交流機構的管理。作者強調了國際私法上的當事人意思自治原則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arty Autonomy Principle) 在孔子學院協議分析中的應用。<sup>12</sup> 第三篇論文認為孔子學院的爭論既是關於現代性構成的規範性爭論，也是關於孔子學院如何運作的實證經驗辯論。作者考察了在孔子學院課堂上，如何通過對言論自由和人權憲法的參照，將中國建構為一個「不自由」(illiberal) 的國家。有關的爭議經常圍繞著宣傳、阻礙課堂上的表達自由和探究自由等指控展開。此章闡述了有關課堂上實際發生情況的民族誌細節和文化本質上的差異，以探究「常識」(commonsense) 中的言論自由概念，實際上如何再現於未被質疑的「自由」(freedom) 概念的全球權力等級制度。<sup>13</sup>

一般中文的學術會議論文集較為鬆散，這本論文集則頗具巧思，除了以不同時

<sup>10</sup> Michael Wing-hin Kam, "Churchman, Banker, Educator: Lam Chi-fung and American Church Resources in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in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pp. 153-168.

<sup>11</sup> Shao-cheng (Michael) Sun, "China's Soft Power Strategy 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pp. 171-187.

<sup>12</sup> Liu Huichun,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the United States: Legal Considerations," in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pp. 188-204.

<sup>13</sup> Jennifer Hubbert, "[Un]Free Speech: Constructing Modernity in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in *From Missionary Education to Confucius Institute*, pp. 205-221.

期呈現中美文教的主要特徵和演變，各篇內容主要通過一些更細緻的個案分析文化差異和認知如何影響了當時的中美關係，這一根本性的問題也反映在編者所關注的孔子學院的案例上。本書各篇文章通過微觀敘事的透視，反映了二十年來因資料上更容易掌握，由具體個案所挖掘出的故事內涵也愈來愈豐富。就此而言，本書已與前輩學者的研究取徑有所切割，但我們仍不能忽略過去具有指標意義的研究。提到近二十年較具代表性的中美教育文化的專書，則不能忽略以下三本：一、路康樂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探討清末自強運動開展之際，清政府派遣了 120 名少年赴美留學及突然召回的經過，這些歸國學生在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占有一席之地，其中一些人還晉升至清政府的高級行政和政治職位，例如晚清外交官梁敦彥 (1858-1924)，就是首批留美幼童。<sup>14</sup> 二、葉維麗 (Ye Weili)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可以說是英文世界第一本較詳實討論留美學生群體的專書。作者不僅探索數個世代的留美學人為中國尋找現代之路的思想和社會實踐軌跡，並且闡釋留美學人在異國多方面的生活體驗，包括學生社團、專業活動、種族歧視、新的娛樂和文化表達形式，以及女學生在兩個不斷變化的社會中所面臨的獨特挑戰。<sup>15</sup> 三、李洪山 (Li Hongsha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State, Societ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05-1950*。關於二十世紀上半葉的中美教育交流，以往研究集中在教會學校和中國留學生團體本身，對政府的作用探討不多，而李洪山的研究揭示了二十世紀上半葉中美兩國教育文化關係的急劇擴大和完全終止，係主要來自政府力量深度介入的結果。得益於政府的支持與合作，教育交流成功地傳播了知識，增進了兩國人民跨越文明鴻溝的相互理解；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冷戰開始後，中美教育文化的管道戛然而止，證明政府「有形的手」(visible hand) 在中美關係中最具建設性，也最具破壞性。<sup>16</sup>

<sup>14</sup>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to the World: The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sup>15</sup> Ye Weili,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sup>16</sup> Li Hongshan,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State, Societ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05-195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2008). 李宏山最新力作 *Fighting on the Cultural Front: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從書名看來為闡述美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冷戰文化戰線上的對抗，時間則涵蓋二十世紀 40 年代末到 70 年代末，文化互動在美中國關係變化中所扮演角色的起源、演變和意義。Li Hongshan, *Fighting on the Cultural Front: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4).

若本書的研究題旨即如書名《從傳教士教育到孔子學院：中美文化交流的歷史反思》所示，筆者以為這本論文集所收錄的文章對於清末民初美國教會在華傳播所帶動的中美文化交流，特別是 1860-1890 年仍較為不足。新近有不少著作嘗試以傳教士個人、教會團體和機構的運作與中國本土社會的互動聯結為敘事主體，重構中美文化交往的歷程。例如 2023 年 John R. Haddad 所著《文化碰撞：美國傳教士、中國抗拒與中國現代制度的興起》(*Cultures Colliding: American Missionaries, Chinese Resistance, and the Rise of Modern Institutions in China*)，重新書寫了 1860-1900 年美國傳教士在中國的傳教事業，他以賽珍珠的父親賽兆祥 (Absalom Sydenstricker, 1852-1931) 做為早期美國教會在華傳教的模式代表 (單純傳播福音為主)，再到美國著名報人亨利·魯斯的父親路思義 (Henry Winters Luce, 1868-1941) 做為借重西式教育文化的引入以擴大傳教事業的模式代表。作者靈活地講述了這一變革性的機制——它是如何發生、為什麼發生及其後果。1860 年代初期中國人大多將傳教士視為不受歡迎的破壞者，衝突隨之而來。然而，這場失敗的運動最終如何改變中國人思想、贏得人心？關鍵在於許多傳教士選擇了創新。1900 年，這一批美國傳教士在中國建立了學校、學院、醫院、博物館，甚至基督教青年會分會，使中國實現了現代化。二十世紀初的美國傳教士及其機構既接受了新的美國理念，也開始傾聽中國社會的聲音，最終建立了現代機構並推動制度的轉化。該書在學術觀點上雖無太大的突破，但鋪陳的方式頗有新意；作者從傳教士個人、女性傳教士醫生、基督教青年會及其志工，乃至於中國早期的傳教士 (例如顏永京 (1838-1898) 等人)，做為中美教育文化橋樑的媒介者，來討論中美社會文化的歧見、碰撞和妥協。《文化碰撞》一書的寫作方式亦和前述論文集收錄的數篇文章有相似的研究取徑，亦即選擇個案置入於大時代的書寫方式，反映了近年來以人物、事件和記憶為主的敘述史學之書寫趨勢。<sup>17</sup>

本書最大的貢獻是梳理了各個階段中美教育交流背後持續存在的動機和調合現象，這對於解釋百年來中美長期交流的廣度和不同階段的持續 (或斷裂)，尤為重要。就評價一本會議論文集而言，不能採取如同對學術專書之要求，責其架構縝密、章節呼應，而是針對各篇論文是否帶來最新研究觀點，考察支撐其觀點的材料是否可信及其論述的邏輯性。就本書各篇內容而言，雖然並非篇篇佳作，但整體而言已達到學術水準，並且在選題上頗有新意。全書的導言十頁和餘

<sup>17</sup> John R. Haddad, *Cultures Colliding: American Missionaries, Chinese Resistance, and the Rise of Modern Institutions in China*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2023).

論四頁，說明了編者之所以編撰此書的問題意識和研究關懷，書中個案選擇了男性（馬寅初、吳雷川等人）、女性（從事家政工作者）、群體組織（寰球中國學生會、山西弟兄教會、華美協進社、孔子學院等），不僅探討基督教會和傳教士在中國的事業，也討論了孔子學院在美國活動的動機。全書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的九篇論文立基於一手文獻，賦予個案在跨國文化流動所突出的意象和新穎詮釋，為較精彩的一部分。雖然第四部分關於孔子學院的文章間並沒有對話或一致的觀點，但這種分歧也說明孔子學院在美國的爭議和困境。本書所引的中文人名、機構和文獻均未有中文拼音，較不符合英文學術專書的規範，且不利於讀者查核。總之，本書的貢獻在於提供了更多民國時期和冷戰時期的個人和運動的例子，並基於軟實力、法律框架和學術自由等概念討論對孔子學院的不同看法。從歷史反思百餘年中美教育交流，這可能是促成未來中美良好關係的最重要源泉之一，這亦是本書編者在「餘論」中深切的期待。

（責任校對：廖安婷）

（收稿日期：2024. 2. 20；修正稿日期：2024. 5. 5；通過刊登日期：2024. 5. 20）

